

伊朗“光明行者”活动初探^{*}

李福泉 金 鹏

“光明行者”活动在当今伊朗政府的宗教文化战略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至今没有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它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到两伊战争战场遗址纪念烈士为核心的大规模宗教文化活动。该活动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和精神性、强烈的什叶派因素、情景的现实性以及政府的全面介入等特点。它把以伊玛目侯赛因为集中体现的什叶派烈士文化作为核心叙事，实现了什叶派信仰与烈士文化的高度结合。它还借助人们对两伊战争的集体记忆，以一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宣扬着伊朗政府的宗教观、历史观、战争观和国家观。经历“光明行者”的精神洗礼后，许多朝拜者强化了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把烈士作为生活的榜样，伊朗政府由此实现了这一活动的核心目标。

关键词：伊朗 “光明行者” 烈士 什叶派

作者 李福泉，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金鹏，伊朗德黑兰大学人文学院伊朗历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伊朗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什叶派国家。鉴于什叶派在伊朗的巨大影响，研究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对于理解伊朗国家具有独特的意义。“光明行者”（Rahiane Noor）是当今伊朗规模最大的宗教文化活动之一，2016 年参与者多达 600 万。^①“光明行者”是指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伊朗政府每年组织大量民众前往战场遗址，进行各种带有强烈什叶派色彩的活动。在当前伊朗政府的宗教文化战略中，“光明行者”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对其缺乏了解，汉语论著中没有任何相关信息。鉴于此，本文将依据田野调查^②，并结合英文和波斯文资料^③，对其展开初步研究。

一、“光明行者”的缘起和发展

“光明行者”形成的初始动因是一些伊朗民众自发去两伊战争战场纪念烈士，但其发展到目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01 年以来伊朗政教关系研究”（17BZJ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Amar Gaeran Rahiane Noor be 6 Milion Resid”，19/12/1395，http://www.irna.ir/fa/News/82458507/，2017 年 6 月 5 日。

② 作者李福泉曾于 2017 年 3 月 7-12 日和伊朗阿拉梅·塔巴塔伊大学学生参加该活动，金鹏曾于 2016 年 3 月 8-13 日和德黑兰大学学生参加该活动。此外，两人就该活动曾与多位伊朗人做过交流。

③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光明行者”的研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英语学术界有较多论文和著作探究伊朗的烈士文化，但直接涉及“光明行者”的极少；波斯文论文则大多从旅游角度考察，以宗教角度研究的论著尚未出现。

前的庞大规模，却是伊朗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纵向而言，它从发源到现在有3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伊朗民众自发进行到政府完全主导的过程。两伊战争从1980年开始，持续8年时间，造成至少30万伊朗人死亡，给伊朗国家和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影响。战争期间，部分烈士家属到伊朗军队收复的失地悼念自己失去的亲人。^①1988年战争结束后，在伊朗春节和阿舒拉节等节假日期间，以老兵和烈士家属为主的伊朗人会自发组团，乘坐大巴或开私家车前往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省战时的前线阵地和军营游访。当时，这一活动在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光明行者”。^②依据伊斯兰教，“光明”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光明行者”按字面意思指追求光明的人，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活动寻找和接近真主，成为以烈士为表率优秀穆斯林。^③在波斯语中，参加这一活动和游访什叶派圣墓一样被称为“朝拜”（ziyarat），参加者被称为“朝拜者”（ziyarati）。因此，就名称而言，“光明行者”在开始时就带有强烈的宗教含义。对于早期自发的朝拜者而言，前往战场纪念烈士不是纯粹的世俗活动，而是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

1997年，在上述民众的影响下，伊朗的大学生巴斯基^④开始进行类似的朝拜活动。此后，各地的巴斯基陆续参与其中。随着影响的扩大，“光明行者”受到了伊朗政府的关注。在两伊战争结束后，部分新一代年轻人不仅逐渐淡忘了战争，而且对宗教功修也缺乏热情。这一态势被宗教立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视为巨大的危机。伊朗政府注意到了“光明行者”蕴含的巨大价值，开始介入其中。于是，1999年成为“光明行者”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伊朗现任领袖哈梅内伊第一次前往最重要的战争遗址——沙拉姆柴（Shalamche）慰问参观。领袖的这一举动不但引起了伊朗军事部门对“光明行者”的特别关注，还使人们朝拜战争遗址的热情不断高涨。^⑤就此，“光明行者”的规模迅速扩大，它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和个人行为，而开始向政府行为转变。2000年3月初，伊朗武装部队总部牵头成立“光明行者”中央总部（Rahiane Noor Central Headquarter），对该活动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其内容包括运营战争纪念地、监管各项朝拜活动、组织各个基地的历史讲述以及提供后勤服务等。在政府的直接介入下，什叶派宗教仪式成为“光明行者”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核问题的爆发，伊朗进一步受到美国的制裁。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伊朗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此国际形势下，“光明行者”的作用更加凸显，它被伊朗政府赋予复兴伊朗民族和宗教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使命。^⑥2002年3月底，领袖哈梅内伊前往战争纪念地杜库赫（Dokouheh），明确强调一定要集中各种力量办好该活动，伊朗政府由此更加重视“光明行者”。2005年，在“光明行者”中央总部的提议下，伊朗政府建立了两伊战争遗产保护基金会，“光明行者”就此开始了文化层面的各项工作，更加注重宗教文化的宣传活动。^⑦这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也在“光明行者”活动的操作运营中予以了巨大支持。2006年3月，领袖哈梅内伊前往战争纪念基地代哈

①⑦ 参见“光明行者”官方网站，<http://rahianenor.com/>。

② Nodar Raozeigei, Ali Isgor Feruzi Joyaona, “Gardeshgariye Jang: Tahlile Keifi Safare Rahiyane Noor be Manataghe Amaliyati”, *Majalleye Barname Rizi va Tose'eye Gardeshgariye*, No. 17, 1395, p. 102.

③ “光明行者”的波斯语原文为 Rahiane Noor, 英文翻译为“The Followers of Light”或“Parth of Light”, 笔者依据该词原意, 结合自己调研, 翻译为“光明行者”。

④ 巴斯基 (basji) 全名为“被压迫者动员组织”, 是1980年在霍梅尼命令下建立的准军事民兵组织。它以伊斯兰革命为主要意识形态, 在各大城市和城市有分支机构。

⑤ H. Ghaed Ali and M. Latifi, “Olguye Paradaimie Orduhayeh Rahiane Noor”, *Paasdaarie Farhangi*, No. 10, 1394, p. 6.

⑥ 参见哈梅内伊官方网站 “Cultural Attacks by the Enemy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Military Attacks”, 6 March 2017, <http://english.khamenei.ir/>, 2017-6-1.

勒维 (Dehalvie) 朝拜, 直接推动了“光明行者”在全国的发展, 使其成为各个省份和阶层的伊朗人参加的大规模宗教文化活动。2007年, 伊朗总统特使和全体部长配合领袖哈梅内伊的意愿, 第一次集体前往战争遗址朝拜。从此, 参加“光明行者”成为伊朗历届政府每年的一项固定活动。同年, 伊朗议会通过了设立“光明行者”专门预算的提议, 从经费上开始大力支持该活动, 这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9年, 管理两伊战争各种纪念地的具体任务被委派给了革命卫队、巴斯民兵组织和公安民警系统, “光明行者”活动由此开始从早期伊斯兰化的基础上高度军事化。“光明行者”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系统分部、“光明行者”公安民警系统分部、“光明行者”军事武装系统分部和“光明行者”伊斯兰神学院系统分部相继成立。而且, 随着“光明行者”政策制定委员会和特别工作小组的成立, 原先的“光明行者”中央总部进一步负责总体指挥和宏观管理。2010年3月底, 领袖哈梅内伊前往战争纪念地法提赫莫勒比 (Fatholmubin) 进行视察, 他肯定了中央总部的各项活动, 并高度强调了“光明行者”的重要意义。此后, “光明行者”从一个原先仅仅局限于波斯历一月初到二月底的季节性活动转变为一个全年不受时间限制的活动。同时, 其活动的区域也不再仅仅是胡泽斯坦省, 而是两伊战争发生过的所有西部五个省份^①。“光明行者”活动也向青年学生扩展。2011年, 伊朗教育部将该活动确定为高中必修的社会实践课, 参加该活动成为全国所有高中生毕业的必要条件。2013年, 伊朗旅游文化部门把“光明行者”活动列入了全国精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波斯历1月20日 (公历4月11日) 也被国家公共文化部确定为“全国‘光明行者’活动日”。^②近年来, 哈梅内伊每年都对“光明行者”进行最新的指示, 这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最大推动因素。^③到2016年, 伊朗全国史无前例地有600万人参加“光明行者”。2017年3月, 哈梅内伊在向“光明行者”官员发表讲话时, 以战略高度阐释了“光明行者”的作用, 要求各方进一步完善该活动。鉴于领袖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光明行者”必将是伊朗未来数年内一项持续性的宗教文化现象, 值得分析和研究。

二、“光明行者”的特点

在伊朗, “光明行者”是与朝拜马什哈德和卡尔巴拉圣城并称的三大什叶派宗教活动之一。但是, 与后两者分别纪念第八任伊玛目里扎和第二任伊玛目侯赛因不同, 它把悼念两伊战争的烈士作为活动的核心。每年, 全国各地的伊朗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西部省份的两伊战争战场遗址, 以多种形式纪念战争中牺牲的士兵。总体而言, 它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政府的全面介入。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后, 宗教的政治化和国家化是伊朗的一大显著特征。伊朗政府介入了国内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成为所有大型宗教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光明行者”原本是伊朗部分民众的自发行为, 却很快被政府所主导。1999年以来, 领袖哈梅内伊多次视察, 直接推动“光明行者”快速发展。伊朗政府始终决定着纪念的形式和内容, 使得“光明行者”高度宗教化、制度化、标准化和组织化。无论是食宿交通, 还是战争遗址参观, 整个过程都处在“光明行者”中央总部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之下, 尤其是遍及全国的民兵巴斯基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

① 包括西阿塞拜疆省、库尔德斯坦省、克尔曼沙阿省、伊拉姆省和胡泽斯坦省。

② H. Ghaed Ali and M. Latifi, “Olguye Paradaimie Orduhayeh Rahiane Noor”, *Paasdaarie Farhangi*, No. 10, 1394, p. 7.

③ Saeid Mohamad Tabtaboei, “Rahiane Noor Bastar Hefz va Nahr Farhang Defae Moghadas”, *Faslname Takhasosi Motaleat Defae Moghadas*, No. 15, 1394, pp. 7-8.

每个大学，凡自愿参加的教师和学生都在巴斯基办公室提前报名。参加者需缴纳象征性的费用^①，它远远不够因交通和食宿产生的实际花费，因此它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近年来，活动组织方欢迎外国人参加，但需要提供护照信息和简单说明参与目的。

“光明行者”的参加者以高中生和大学生等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全过程都是强调遵守纪律的集体活动。在“光明行者”的高峰期，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和大学生被动员到战场做志愿者，解决了急需的人力问题。每个朝拜团队除了有多位巴斯基民兵负责管理协调和后勤服务，有一位阿訇负责领拜和提供宗教指导，还有一位马达赫（maddah）负责领唱名为努亥（nuheh）的什叶派哀歌。他们都具有官方身份，直接面对朝拜者，是国家话语的主要阐释者。在每个战场，都有大量军警维持秩序和数量更多的志愿者提供各种服务。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下，数百万人参加的“光明行者”即便在高峰期也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活动本身也显示了伊朗政府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二是鲜明的宗教性和精神性。“光明行者”虽以纪念烈士为主轴，但显示出明显的宗教特征。“光明行者”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的宗教内涵。该活动抛弃了物质享受，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精神之旅。在人们的意识中，烈士注重精神生活，没有多少物质欲望。烈士都是优秀的穆斯林，宗教虔诚，崇拜真主，按时礼拜。因此，伊斯兰教是“光明行者”的重要组织原则。无论是报名，还是参加活动，男女都分开进行。每个代表队的成员全都是男生或者女生，以符合伊斯兰教性别隔离的规定。即便气温高达 30 多度，所有女性在活动期间都必须穿黑色的查兜尔（chador），要把手和脸之外的身体部位遮盖起来。组织者给每个参加者除了赠送查费耶（chafiye）和介绍烈士的书，还有赞念真主使用的念珠和礼拜用的毛赫尔（mohr）。^②

大家集体乘坐火车或者大巴抵达战场，来自东部省份的朝拜者需要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早晨大约五点钟起床礼拜，早餐后七点多乘大巴车出发，晚上往往很晚才能到下一个住处。由于各战争遗址相距遥远，每天一半左右的时间在路途中。白天忙于走访遗址和参加活动，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身体的劳累是大家共同的感受。^③早中晚三餐时，大家席地而坐，吃得比较简单，而且每个人都一样。晚上住在旧的军营和战地医院，数十人或上百人在一个屋子，大家要么睡在铺着毯子的地面上，要么睡在高低床上，床铺的使用者每天都在变化。由于人很多，去卫生间往往需要排很长的队。虽然条件有点艰苦，但朝拜者之间的气氛十分融洽。就像在宗教圣城一样，有好多志愿者出于服务他人的宗教精神，免费为大家擦鞋子。有人专门携带战场的泥土，打算回去做礼拜用的毛赫尔。朝拜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娱乐形式，都是各种纪念活动。即便在汽车上也有阿訇演讲，或者播放纪念烈士的音乐。作为穆斯林重要的宗教功修，礼拜受到组织者的重视，早中晚三次礼拜^④一般都按时进行。活动不仅讲述战争，传递记忆，也注重传授宗教知识。阿訇全程陪同，给大家讲解礼拜、结婚、家庭和堕胎等各种相关的教法问题。宗教因素是“光明行者”无处不在的存在。^⑤

三是强烈的什叶派因素。伊朗 90% 的国民是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文化深刻影响着伊朗的

① 阿拉梅·塔巴塔伊大学学生每人缴 30 万里亚尔（大约仅相当于 50 元人民币），教师免费，组织者负责来去 6 天的食宿和交通。

② 查费耶是一种方形围巾，凡上战场的伊朗军人都喜欢戴，它已经成为神圣防御的象征。毛赫尔一般是用泥土做的圆形或者方形扁状物体，什叶派认为，做礼拜时必须使用毛赫尔，以便让额头与大地接触。

③ 笔者李福泉参加过这场活动，返回德黑兰后，连续睡眠 12 个小时身体才完全恢复。

④ 与逊尼派每天五次礼拜分别进行不同，什叶派把晌礼和晡礼、昏礼和宵礼分别合在一起进行，中间只间隔几分钟。

⑤ 每次当演讲者提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或者说了“萨勒沃特”（salwot）一词时，大家都要齐声说“原真主赐福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裔”。每天要重复数十遍。

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光明行者”的组织者有意借助什叶派信仰，来服务于纪念烈士这个中心。伊玛目侯赛因及其罹难的卡尔巴拉事件成为最重要的宗教资源。

“光明行者”主要通过阿訇和马达赫体现什叶派因素。在战场参观时，阿訇始终陪伴着大家，他以什叶派的角度阐释烈士的意义，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的献身精神。马达赫在整个活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每个战争遗址，他都会领唱什叶派特有的哀歌，大家有节奏地用手拍打自己的胸脯进行配合^①。哀歌的内容以悼念伊玛目侯赛因为主，还有侯赛因的妹妹宰纳布和第一任伊玛目阿里等。唱哀歌是每个地方纪念活动的高潮，大家全情投入，许多人因为侯赛因的遭遇而痛哭。马达赫触动着每个人的宗教感情，把烈士与什叶派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阿訇和马达赫都用卡尔巴拉事件解释战争，称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就像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成为烈士一样，将士兵在战场上作战的艰难和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遭遇相类似。^②许多朝拜者在战场有意不喝水，不仅因为当年侯赛因和其追随者由于敌人的围堵无法得到饮水，也是为了感受两伊战争的烈士曾面临的艰苦条件。战争极为惨烈的沙拉姆柴是朝拜者最多的地方。对许多人而言，沙拉姆柴由于有无数烈士，就像天园一样，真主在这里无处不在，他们更愿意在这里向伊玛目侯赛因倾诉。在塔拉伊赫(talayih)，所有男性朝拜者都在额头佩戴绿色丝带，上面的文字表达着愿意去援助伊玛目侯赛因的妹妹宰纳布的决心。在所有的战场，极少见到伊朗国旗，主要是红色、绿色和黄色等旗帜，上面有大量写给侯赛因等什叶派伊玛目的话。

四是情境的现实性。伊朗每年有多种纪念烈士的形式，“光明行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两伊战争发生过的真实战场作为活动的场所。在这些特殊的地点，它灵活运用多种手段，有效刺激每个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最大限度地再现战争当年的情境，以此激发情感，加强记忆。

在最重要的胡泽斯坦省，有大约15个参观地点，除了少数烈士博物馆和墓地，绝大多数是当年伊朗士兵战斗和牺牲的战场，有的离伊拉克只有几百米。乘坐大巴到附近后，大家步行前往每个战争遗址，许多人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敬意，脱鞋赤脚行走，因为大家认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着烈士的鲜血。战场上有大量生锈或者已被毁坏的坦克和其他战车，也有禁止入内的警示牌^③，水中还有许多小船和带刺的铁丝网。在道路两旁除了无数以红色为主的旗帜，还有大量烈士生前的照片，也有扩音器传来当时的枪炮声和战士的呐喊声。到达每个地方后，大家都要在地上坐一两个小时，听一位或者两位参战老兵拉维(ravi)细致而动情地讲述这里的战争情况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几乎每个人都在仔细听讲，不时被感动得流泪哭泣。组织者精心设置的场景拉近甚至消除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战争不再是遥远的过去，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对烈士的处境感同身受，他们的遭遇不再模糊，而变得清晰。很多次，朝拜者静静地坐在无名烈士的墓碑旁哀悼他。男生就像当年参战的士兵一样，一直戴着查费耶，象征着大家随时准备走上战场，成为烈士。朝拜者不仅动用了听觉和视觉，还用使劲拍打胸脯等身体的动作强化记忆。对于朝拜者而言，对烈士和伊玛目侯赛因的哀悼既是一种集体的仪式，又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他们对烈士的感情具有传递性，并成为塑造和定义记忆的最有效方式。通过所见所闻，卡尔巴拉事件和烈士经历内化为朝拜者难以消除的个人记忆，进而对其后来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三、“光明行者”的叙事模式

对于“光明行者”的组织者而言，采用何种叙事模式，进而让数百万朝拜者接受和信服它，

① 拍打胸脯有三种形式：双手同时拍、双手交替拍以及单手（主要是右手）拍。

② Hosein Ardesteini, “Asiba Shenasi Rvayathaye Ravean Rahian Noor”, *Faslname Takhasosi Motaleat Defae Moghadas*, No. 15, 1394, pp. 14 - 15.

③ 部分地方还有当年战争时埋下的地雷。

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基本办法是充分利用伊朗的两种重要传统，即烈士精神和什叶派信仰，构建出一种融合世俗和宗教两种因素的叙事模式。它借助什叶派信仰，对烈士进行宗教化的解释，使其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性。在烈士和什叶派信仰之间，“光明行者”找到了一个最佳中介，即伊玛目侯赛因。一方面，侯赛因被什叶派视为烈士之王，是什叶派中所有烈士的表率；另一方面，侯赛因是什叶派最挚爱的伊玛目，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最集中的体现，最能触动他们内心的宗教感情。因此，侯赛因是烈士和什叶派信仰的完美统一体，侯赛因体现的什叶派烈士文化成为“光明行者”的核心叙事，其实质是利用侯赛因及其卡尔巴拉事件实现什叶派信仰与烈士文化的高度结合。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一叙事模式不是伊朗政府偶然为之的产物。它既根植于伊朗的民族传统和什叶派信仰，又是两伊战争宗教化解释的逻辑结果。

依据学者的考察，伊朗有悠久的推崇烈士的传统。^①在波斯语中，烈士对应的词是舍希德 (shahid)^②，它源自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被伊朗人所接受，成为伊朗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把什叶派定为国教后，伊朗的烈士文化和什叶派开始紧密结合，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被杀的卡尔巴拉事件成为伊朗什叶派烈士文化宣扬的根本内容。公元680年，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叶齐德所派的军队把侯赛因及其随从杀死在卡尔巴拉，这一事件被什叶派解释为以叶齐德为代表的恶与侯赛因为代表的善之间的对抗。^③侯赛因被称为“烈士之王”，是弱者反抗强权和邪恶的榜样。侯赛因为了“真正的伊斯兰”而牺牲，是什叶派信仰的完美体现。他的牺牲代表的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善与恶的永恒斗争。这一被称为“卡尔巴拉范式” (Karbala Paradigm)^④的宗教话语体系对伊朗什叶派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沙利亚提 (1933 - 1977年) 为代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家号召大家学习侯赛因的殉道精神，什叶派信仰成为反对国王巴列维的有效手段。按照他们的解释，国王巴列维是20世纪的叶齐德，而伊朗民众则是被压迫的侯赛因。效仿侯赛因反抗不义成为鼓舞伊朗人民推翻国王统治的强大精神力量。在1979年革命胜利后，殉道的含义进一步政治化，并具有了国际维度。任何在反对美国、伊拉克和以色列等一切外部敌人的斗争中遇害的人，都被伊朗政府称为烈士。卡尔巴拉事件及其相关仪式被用来激发人们自我牺牲的烈士精神。

1980年伊拉克侵略伊朗进而挑起两伊战争后，殉难的意义被空前强调，成为伊朗政府动员民众参战的强大精神武器。伊朗政府充分利用什叶派宗教，赋予自身神圣性和正义性。伊朗把两伊战争称为“强加的战争”和“神圣防御”，认为自身就像侯赛因在卡尔巴拉一样在抵抗非正义。霍梅尼宣称，参与战争等于在保护卡尔巴拉战役中的伊玛目侯赛因的信仰和价值观。^⑤伊朗军队被称为侯赛因，而伊拉克军队是侯赛因的敌人叶齐德，两伊战争的前线则是卡尔巴拉，走上战场是一种宗教义务，是为了援助侯赛因和捍卫伊斯兰。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打败伊拉克，而是和真主变得更接近。^⑥卡尔巴拉范式主宰着伊朗军人的思想观念，大部分伊朗烈士的遗嘱都频

① Alireza Korangy, "A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rtyrdom in Ir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9, No. 3, 2009, pp. 528 - 543.

② shahid 是单数，复数是 shohada 或 shahidin.

③ Kamran Scot Agaie, *The Martyr of Karbal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p. 9.

④ “卡尔巴拉范式”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费舍尔在1980年提出，成为分析什叶派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 Michael M. J. Fischer, *Iran: From Religious Dispute to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p. 12 - 27.

⑤ Rose Wellman, "Regenerat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The Muslim World*, Vol. 105, No. 4, 2015, p. 566.

⑥ Roxanne Varzi, *Warring Souls: Youth, Media, and Martyrdom in Post-Revolution Ir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0.

频提到卡尔巴拉和侯赛因。^① 侯赛因的遭遇被用来和伊朗的处境相对比。侯赛因和他的追随者被围攻，且被切断水源；伊朗也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只有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极个别国家支持它。伊朗政府的解释使得参战士兵的行为具有了强烈的宗教意义。他们相信，在死亡的那一刻，侯赛因将拥抱他们。什叶派烈士文化由此成为伊朗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两伊战争虽然结束已近30年，但纪念它一直是伊朗全国每年的例行活动。如果说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创造了伊斯兰共和国，那么两伊战争真正意义上塑造了伊朗的国家性格，并把什叶派烈士文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两伊战争重要的精神遗产，这一文化被“光明行者”继承和发扬，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灵魂。它主宰着“光明行者”的话语体系，渗透到活动的方方面面。它通过伊玛目侯赛因这一什叶派宗教人物，大力宣扬什叶派烈士文化，对伊朗民众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无论是充满什叶派因素战争遗址布置，还是老兵、阿訇与马达赫的演讲和领唱，都在以不同方式表达着什叶派烈士文化的叙事。几乎每个战场遗址都有写着卡尔巴拉并朝向伊拉克卡尔巴拉的牌子，以此把这里与什叶派心目中的圣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烈士也不再是孤立的世俗现象，而是拥有了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深刻内涵。正如巴斯基领导人所说，烈士是真主最虔诚的仆人，是援助伊玛目侯赛因的人。^② 烈士被认为是无罪的，他们和真主更加接近，知晓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人们可以祈求烈士援助他们，或者为他们向真主说情。烈士是生活各个领域的典范，他们是完美的儿子、兄弟、丈夫、邻居或学生。殉道行为本身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好人，足以掩盖或弥补他所有的过错。由于烈士的种种宗教化解释，战争记忆和对卡尔巴拉的宗教记忆高度融合，成为无法分割的统一体。主要因为世俗利益引发的两伊战争由于宗教的解释而高度神圣化了。

四、“光明行者”的意义

社会记忆本质上是对过去的重新构建。两伊战争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光明行者”就是伊朗纪念烈士和重构记忆的最重要方式。它以一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宣扬着伊朗政府的宗教观、历史观、战争观和国家观。政治化的什叶派伊斯兰教、非正义的国际秩序、被伊拉克强加的战争以及神圣的伊斯兰共和国等观念都在其中得到了表达。“光明行者”借助人们对两伊战争的集体记忆，改变和重塑着朝拜者的社会想象、宗教认识和政治观念。“光明行者”的参加者跨越了不同年龄和阶层，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但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伊朗政府而言，“光明行者”具有两个彼此区别但又紧密联系的意义。

第一，强化伊斯兰教信仰，使得朝拜者成为热爱宗教的优秀穆斯林。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独特的伊斯兰政权，什叶派伊斯兰教构成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民众宗教热情的强弱对于伊斯兰政权的存续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对宗教丧失兴趣，他们参与宗教活动的热情呈明显下降趋势。据调查，伊朗是世界上民众做礼拜比例最低的伊斯兰国家之一。^③ 这一形势被伊朗政权视为对其合法

① Mateo Mohammad Farzaneh “Shi‘i Ideology, Iranian Secular Nationalism and the Iran-Iraq War (1980 – 1988)”,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7, No. 1, 2007, p. 96.

② “Dorane Defaeh Moghadas Olghuee Mandeghar az Ashuraye Hosseini Ast”, 23/12/1395, 伊朗大学生通讯社, <http://www.isna.ir/news/95122314785>, 2017年6月6日。

③ 据2003年在德黑兰的调查，只有不到30%的伊朗穆斯林一周至少一次到清真寺做礼拜。参见 Gunes Murat Tezcue et al.,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mong Middle Muslims: Iranian Exceptionalism”, *Critique: 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5, No. 3, p. 221.

性的严重威胁，如何调动民众的宗教热情成为其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此情况下，“光明行者”应运而生，并在伊朗政府的宗教教育和宣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光明行者”是一个超越特定时空和渗透宗教因素的精神之旅。对于伊朗什叶派而言，纪念烈士本身是一种宗教义务，是获得真主回赐的必要方式。^① 一个公民要努力成为铭记真主的人，因为这正是烈士做出的典范。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朝拜者脱离了物质世界，进入了战场这一精神空间，经历各种特定的仪式后，又重回物质世界。在此过程中，朝拜者获得的神圣资源成为影响他们的无形力量。对许多人而言，“光明行者”是一种独特的自我转型的经历。他们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和烈士的苦难，被鼓励与某个特定的烈士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他们通过电影、书籍或者别人的讲述等多种形式，了解烈士的信息。有人会保存烈士的照片，探望烈士的母亲，听她讲烈士生前的故事。对他们而言，烈士就像最好的朋友或者慈爱的兄长。他们向他分享内心的秘密，倾诉烦人的苦恼。烈士与他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强烈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于“光明行者”，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要像烈士一样信教虔诚，遵守真主的诫命，也应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内心私欲，多为他人着想，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优秀成员。实际上，宗教成为衡量他们是否像烈士的最重要标准。他们往往会积极参加宗教活动，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生活。他们会放弃听流行歌曲，而选择宗教音乐。部分女生以前不喜欢戴头巾，回来后却穿上了黑色的查兜尔。

有些人把“光明行者”比喻为精神能量的充值。虽然它的效果明显，但不能永远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朝拜者会“遗忘”在战争遗址的经历，进而需要再次“充值”。因此，许多人多次参加“光明行者”，有的甚至去了七八次。前往两伊战场尤其是沙拉姆柴，成为他们最大的梦想。^② 因此，参加“光明行者”无异于一场精神的洗礼，它唤醒和强化了许多人的宗教意识，把宗教置于他们生活的核心地位，而这种变化是和他们学习烈士的强烈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强化国家认同，使得朝拜者成为热爱国家的优秀公民。

对于伊朗而言，两伊战争记忆的核心就是无数烈士为了保卫伊斯兰教和国家而献出了生命。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政府创立了多种机构，来宣传烈士文化。当前，纪念烈士是伊朗任何人不可质疑的国家事业。^③ 伊朗政府掌握着宣布某人为烈士的权利，^④ 把纪念烈士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主要手段。伊朗的大量街道、公路、机场、学校和医院都以烈士命名，无处不在的墙画和海报上都是烈士的画像。伊朗政府认为，两伊战争以伊朗的胜利而告终，是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集体记忆，“光明行者”正是保存战争记忆和传递烈士文化的有效方式。

“光明行者”所宣扬的烈士话语塑造着朝拜者的自我认同，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实现定位提供了指引和空间。烈士不仅是宣扬价值观的最佳载体，也是个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完美中介。“光明行者”强调，没有烈士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伊朗。对于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殉道是必要的集体行为。^⑤ 在“光明行者”的各个战争遗址，旗帜大多是红色，而在烈士的墓地，则几乎都是伊朗国旗。在霍韦伊泽（hoviyeze），每个烈士的陵墓上都悬挂着一幅国旗，彰显着烈士

① Faegheh Shirazi, “The Daughters of Karbala”, in Kamran Scot Aghaie ed., *The Women of Karbal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 94.

② 笔者曾让阿拉梅·塔巴塔伊大学汉语系大四学生写作文《我的理想》，一个学生把再次去战场沙拉姆柴作为自己的理想。

③ 在伊朗，每个大学都有必修课《神圣防御史》，其教师必须参加过两伊战争，且必须经过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准。

④ Ravinder Kaur, “Sacralising Bodies on Martyrdom, Government and Accident in Ir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No. 4, 2010, p. 442.

⑤ Arthur G. Neal, *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Routledge, 2005, p. 199.

的爱国主义精神。“光明行者”鼓励民众牢记烈士，并向烈士学习，以此把对烈士的纪念转变为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忠诚和服从。对于许多人而言，参加各种活动纪念烈士是一种道德义务。烈士是激励年轻人爱国爱教的榜样。即便是那些否认烈士神圣属性的人，也会把他们视为英雄，并愿意牺牲自己保卫国家。^①因此，“对于国家而言，使得烈士活在人们心中的做法与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②。烈士实际上是国家价值观的传递者，在追随烈士的同时，“光明行者”的朝拜者也确认了国家的合法性。当朝拜者愿意为国牺牲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优秀公民。

由上述可知，“光明行者”虽然呈现出宗教性的特点，但政治性才是其本质特征，巩固和维护伊斯兰政权的政治需求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伊朗政府深信，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毫不矛盾，一个优秀的穆斯林必然是爱国的好公民。以烈士为载体，“光明行者”把宗教信仰和爱国精神高度融合在一起。它以什叶派信仰强化了爱国主义，而纪念烈士本身又巩固了宗教信仰。虽然“光明行者”也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批评，有人指责它浪费了国家资源，有人反感这种灌输的形式，但是许多人由于它而经历了一次精神转型，尤其是无数处于思想发展关键阶段的青少年被打上了宗教与国家的深刻烙印，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就此再也无法与宗教化的烈士相分离。通过“光明行者”活动，可以对伊朗复杂的政教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责任编辑: 夏德美)

① 一个参与活动的大学生虽然在抱怨政府，但称如果有外敌入侵，他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战场，成为烈士。

② Shahla Talebi, “State and Dissident Martyrs in Post-Revolutionary in Iran”, in Pedram Khosronejad ed., *Unburied Memories: The Politics of Bodies of Sacred Defence Martyrs in Iran*, Routledge, 2013, p. 138.